

# 山西文史资料

第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目 录

|                                   |             |
|-----------------------------------|-------------|
|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纪略·····                  | 牛荫冠 ( 1 )   |
| 牺盟会的成立与晋察冀边区的创建·····              | 宋劭文 ( 50 )  |
| 牺盟会和决死二纵队成立前后的片断回忆·····           | 张文昂 ( 66 )  |
| 在牺盟会和决死队工作的片断回忆·····              | 梁膺庸 ( 94 )  |
| 关于山西抗日战争开始前后的几段回忆·····            | 杜任之 ( 131 ) |
| 决死四纵队在“晋西事变”中的反顽斗争·····           | 王黎生 ( 159 ) |
| 介休牺盟会的建立和武装斗争的回忆·····             | 李志敏 ( 166 ) |
| 抗日战争初期吉县地下工作和在晋东南<br>地区工作的回忆····· | 张秀成 ( 174 ) |
| 军政训练班女生连的回忆·····                  | 张梅华 ( 198 ) |
| “一二·一八”惨案经过纪实·····                | 戎子和 ( 206 ) |
| 关于“一二·一八”惨案的几点补充·····             | 许红错 ( 209 ) |

#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纪略

牛荫冠

一九三七年一月，我受北方局的指派，离开北平到太原，在薄一波同志的领导下，通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这一群众性的统战组织和阎锡山搞统战工作。开始，我在牺盟会太原市委主持工作。一九三七年十月份左右，由于薄一波同志率领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赴晋东北、晋东南开展游击战和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我就调到牺盟总会参与了牺盟会的主要领导工作，直到一九三九年“晋西事变”也叫“十二月事变”后，由于统战工作遭到阎锡山的严重破坏，我才奉党的指示由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撤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这三年多的时间内，我一直在牺盟会的领导机关工作。现将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就记忆所及大略地介绍一下，供同志们参考。

一九三六年十月左右，薄一波同志接受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回到太原主持牺盟会工作以来，牺盟会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了。牺盟会的政治主张，就是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了适应山西的具体情况，把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要求贯彻在牺盟会的实际行动中，由薄一波同志主持，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提出了一个适应于山西现实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来作为牺盟会的行动纲领。后经阎锡山批准，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公布后，也就成了全山西当局的抗

日纲领了。这个纲领和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原则上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在字句上和个别提法上有一些变化罢了。牺盟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一贯坚持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三大口号，也同样都是党提出来的。当时，牺盟会是根据抗日民族革命斗争的根本利益，根据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迫切心愿，根据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提出了“守土抗战（这是借用当时阎锡山提的口号），如愿取得最后胜利，必须不分任何派别、任何职业、任何阶级的男女，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应该组织在我们的队伍中”的号召，得到了全省以及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热烈欢迎。总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就是牺盟会的政治主张。而且就主持牺盟会工作的领导骨干来说，也大都是共产党员。从形式上看，牺盟会是阎锡山办的，甚至还有阎锡山的得力助手梁化之等人参加，但这都是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总原则考虑的，不这样做是不利于团结抗战和民族利益的。

从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在太原开始，直到一九三九年年底“晋西事变”时的秋林止，牺盟会总部和各中心区和县的组织，都是在党中央、北方局、山西省委以及当地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牺盟会是在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组织，是一支对抗日民族革命有重大贡献的重要力量。

## 一、牺盟会是在抗日高潮中产生的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揭开了大举侵略中国的序幕。由于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致使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东北三省之后，更变本加厉地进行侵略，由热河而长城各口，由长城各口而冀东察北，又由冀东察北而绥东晋北。

一九三五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猖狂，“冀察政务委员会”、“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等汉奸傀儡政府相继组成，华北五省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中华民族正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同时也直接威胁着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抗日宣言，全国人民纷起响应，强烈要求抗日。工人、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不断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在中日两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抗日，就连民族资产阶级、农村的富农和中小地主的政治态度也有了新的变化，国民党营垒中的爱国将领也纷纷要求对日作战。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主席并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內战，红军抗日先锋军经过三个多月的东征，主动回师陕北。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红军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这个通电振奋了全国民心，伸张了民族正义，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引起了极大震动。尤其是对阎锡山来说震动更大。

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回师陕北后，由阎锡山请来的蒋介石十个师却赖在山西不走，想借“剿共”之名把阎锡山吃掉。这对阎锡山来说，已成了他当时的最大威胁。他曾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

当时，摆在阎锡山面前的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继续“联蒋剿共”，一条是“亲日反共”，一条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联共抗日”。究竟哪一条路对他有利呢？经他再三考虑，还是从他的“存在就是真理”这一哲学原理出发，最后选定了“联共抗

日”这一条路。就阎锡山本人来说，他虽然和日本人有勾结，但正当日本人野心勃勃得陇望蜀的时候，他想投敌卖国的这一桩买卖是不易达成的；同时，他心里也清楚，如果投靠日本，不仅保不住他在山西的政治统治和经济上的全部利益，反而会戴上汉奸的帽子，成为“千夫所指”的民族罪人。走这一条路风险太大，为时过早，当时他还下不了投靠日本的决心。如果联合蒋介石继续“剿共”，他也知道蒋介石想一箭双雕，但共产党的力量相当强大，红军东征时他已领教过，自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而且又很不得人心，其结果，不是被共产党把他撵出山西，就是被蒋介石借“剿共”之名把他一口吞掉。此路也不通。唯一可走的一条路就是“联共抗日”。这既可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发动和组织起群众来抵抗日本人的侵犯，保存和发展他自己的实力，来作为和日军讨价还价的资本，同时也可以顶住蒋介石想一口吞掉他的企图。而且只要他答应抗日，共产党便不会对他再采取军事行动。他认为这是万全之策。正如他当时所说：“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就要看谁能制服谁了！”主意拿定之后，于是便在一九三六年的下半年提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采取了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新政策”。即由“亲日反共”，一变而为“联共抗日”，由压制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一变而为抓取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权了。

这时，隐蔽在阎锡山政府机关和各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任之等，便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发出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号召。后经阎锡山审定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指定由梁化之召集杜任之、刘岱峰、宋劭文、戎子和、牛佩琮、张文昂、张冀轩、刘玉衡等人正式发起，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那天，正式宣布成立。

当时，太原一方面存在着日本领事馆，挂着日本的国旗，日本特务机关和阎锡山还明来暗去地勾搭。另一方面又允许成立

“牺盟会”这样的抗日组织，不过不让提“抗日”，而只能提“抗敌”。阎锡山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从他的“二的哲学”观点出发，既要抗日，又要和日；既要联共，又要反共。联共抗日并不是他的真意，而是达到他自身“存在”的一种手段。关于这一点，共产党在牺盟会工作的同志们心里是非常明白的。在那时，只要他有一点有利于抗战、有利于进步势力发展的表现，我们就要竭诚欢迎，并由此而发展壮大抗日的力量。牺盟会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牺盟会从总部到各级领导人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就是在牺盟会领导下的各种组织中，共产党员也很多。这一点，阎锡山心里是清楚的，但在当时他想利用共产党来维护他的“存在”，不让牺盟会中有共产党员是不可能的。而且在他看来，有共产党也是不可怕的。他玩牺盟会这张牌不是没经过考虑的。他自认为凭他老奸巨猾的多半生经验，是有办法来对付这些人的。但是在阎锡山上层集团中的旧军政人员，几乎都是反对牺盟会的。在阎锡山面前讲了许多牺盟会的坏话，甚至还在阎锡山面前造谣说什么“山西国民师范挂起了红旗”。意思是说牺盟会都是共产党。我记忆较深的一次是阎锡山从太和岭口退却下来以后，有一天半夜里，突然把我们几个牺盟会的领导人找去说：“现在我要革命了。日本人马上就要进攻太原了。我库里还有一些枪枝，发一万枝给你们牺盟会。”阎锡山要发枪给牺盟会的消息一传出去，就引起了一些军阀、政客的竭力反对。结果减了一半，只给了五千枝。五千枝也好。我们除发给一些县区牺盟会游击队以外，太原牺盟会还留了一些搞训练用。阎锡山的首席中將执法官张培梅就大发议论，说什么“这些小娃娃家也扛起枪来在街上乱跑，我要碰上，非杀他们不行……。”我们为了防止万一，上街的时候总是排着队走。如果他真的要抓、要杀那就麻烦了。从当时来看，上层集团中只有一个阎锡山的警卫旅长杜春沂好象对我

们还表示友好。如薄右丞、邱仰浚，他们都是反对我们的。特别是薄右丞，他是坚决的反对派。

当时我们和阎锡山反动势力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但是由于大势所趋，就连阎锡山也无法阻挡时代的潮流，别的人也只有叫叫嚷嚷而已。

牺盟会从总部到各个委员会以及各中心区和县，可以说共产党和左派势力是掌握实权的。但是也夹杂着一些阎锡山的旧势力。在牺盟会内部，尤其是在刚成立的时候，斗争还是很复杂的。一九三七年太原撤退以前，就听到有一股谣言说什么“牺盟会是薄一波的。”这种谣言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分裂作用和破坏性的。为了及时打击坏人从中离间，由薄一波同志主持在总部整整辩论了一上午。他曾在会上说，牺盟会是牺盟会的，怎么能说成是我的？来牺盟会工作的人大都是由别人介绍来的，又不是我委派的。比如牛荫冠就是由牛佩琮介绍来的，从前我根本不认识他。类似这样的明争暗斗还不少。但占绝对优势的，还是以薄一波为首的一批严格遵守抗日统一战线原则办事的共产党员。

“七·七”事变前后，在太原工作的那一段时间，我们还和一些不利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左”的思想倾向作过不调和的斗争。比如，当时我们就坚决反对过这样一种论调：地主、资本家、绅士都是汉奸的源泉。如果把这一观点运用在实际工作中，就会迫使这些阶层中一些本来不会当汉奸的人走上汉奸的道路。这种“左”的论调，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原则，不利于抗战的。

## 二、牺盟会在太原时期的组织活动

一九三六年十月，薄一波同志主持牺盟会工作后，经过改组，从组织领导、人事配备、工作任务到活动范围，都与初期有很大的不同。

薄一波同志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以后，北方局又增派了杨献



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王鹤峰、傅雨田、李力果、侯振亚、刘有光、廖鲁言、冯基平等十几位在白区工作有经验的党员骨干。同时为了适应阎锡山在用人问题上的特点，北方局又挑选了一些山西籍的同志回到了太原。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原先在北京清华大学学习。曾在清华大学的党支部、西郊区委、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李雪峰同志（当时他是我的党内直接领导人）对我说，要挑选一些对山西情况熟悉一点的同志回山西工作，而且最好是山西人。因为阎锡山不信任外地人，而薄一波带回去的十多个同志又都不是山西本地人。所以这一次你也要回去。于是，我就和武新宇、梁寒冰等同志一起回到了太原。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市委书记安子文和我谈的话，由安写的介绍信。我和薄一波接上组织关系后，薄对我说：“你要自己找职业。能到牺盟会工作更好，不到牺盟会去别的单位也可以。然后我再给你安排党的工作。”随即我便找到原来在清华大学的同学牛佩琮同志，由他介绍我到牺盟会。这时，牺盟会的骨干就多起来了。如在山西本地参加牺盟会工作的宋劭文、戎子和、牛佩琮等同志，都是牺盟会的重要领导成员。

#### （一）太原时期牺盟会总部的领导成员

会长：阎锡山。常委：薄一波、雷任民、冯基平、牛荫冠、宋劭文、傅雨田、梁化之，共七人。

执行委员：张隽轩、杨贞吉、刘玉衡、刘岱峰、戎子和、郭挺一、梁膺庸、张文昂、董天知、周子贞、顾永田、李力果、杜春沂、张干臣、徐宏文、王永和、智生元、薄右丞、楼化蓬，共十九人。

阎锡山指定的牺盟会具体负责人是梁化之和薄一波。当时，牺盟会的负责人称为秘书。但对梁与薄都没有人这样称呼过。

在牺盟会总部下面，设有以下几个组织：

组织训练委员会。负责牺盟会的组织工作、干部训练和干部分配，负责人是李力果。主要干部：吕调元、雷任民、楼化蓬。干事：王仲义、亚苏。在组织训练委员会工作的有二、三十人。

宣传训练委员会。负责牺盟会的宣传工作。在委员会工作的大约有二、三十人，负责人是裴丽生。主要干部：张稼夫、侯振亚。

太原市委员会。是在总部直接领导下的工作单位。它主要负责太原市工人、学生和各阶层的组织发动工作。有时也和总部一起做一些上层人员的工作。负责人（秘书）牛荫冠。

市委委员：傅雨田、梁膺庸、冯基平、黎颖。干事：王耿仁、王世益、赵辉。

市委会下属五个区。各区负责人：一区张国声。二区顾永田。三区郭景伍、高晋才。四区牛荫冠（兼）、王兴让。五区李涛。

抗敌救亡先锋队（简称“抗先”）。队长：董天知。在总队工作的有：纪毓秀、凌则之、陈永年、王竞成、陈大东、陈颀学（陈岱）、叶其瑾。

总务负责人：戎子和。

## （二）牺盟会领导下的各政治机构及其组织概况

军政训练委员会是培养军政干部的一个专设机构，成立于一九三六年八、九月。薄一波主持牺盟会工作以后，归牺盟会领导。会长阎锡山，政治助理赵戴文，军事助理杨爱源。具体负责人梁化之、薄一波。军政训练委员会内设：

军训部部长杜春沂，政训部部长梁化之，政训处主任干事刘岱峰，组织部部长薄一波，总务负责人耿誓。

军政训练委员会下设：军政训练班。最初有五个连队，后来扩充为十二个连队。其中有几个连队的学员较特殊，如六连和七连，都是红军东征时被俘的红小鬼，还有政治犯和进步青年。

十一连学员为女生。训练班指导员的来源分三个阶段：一九三六年八月至十月主要是由白强救国同志会派遣的阎锡山的政工人员担任；一九三六年十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主要是由薄一波派遣的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一九三七年八月以后，各连队原有的指导员都被调往国民军官教导团工作，就从原来连队的干事中提升。曾在各连队担任过指导员的人，大约有：一连 杨贞吉。二连 童克明。三连 崔道修。四连 周新民。五连 牛佩琮、韩钧。六连 周仲英、杨献珍。七连 雷任民、戎子和、周仲英。八连 张韶芳、张汝俊。九连 谷景生。十连 王鹤峰、智力展、周仲英。十一连 刘亚雄。十二连 韩钧、廖鲁言。

民训干部团。成立于一九三六年底，是专门训练民运干部的机构。总负责人是牛佩琮和张隽轩。牛佩琮兼政训主任。民训团共有七个队：一队指导员张隽轩，政治工作员 刘有光。二队指导员牛佩琮。三队指导员李一清、刘有光。四队指导员王鹤峰。五队指导员王耿仁、智力展。六队指导员杨献珍。七队指导员雷任民、徐荣。

国民兵军士训练团及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祁县、太谷成立了两个国民兵军士训练团，训练班 级 军 士 干 部。一九三七年四月，又成立了八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培训中下层军事干部，在全省招收学员。原计划训练六个月，实际上“七·七事变后即告结束。各团工作人员均由晋绥军官教导团和军士训练团中调来。各团、营级军官由阎锡山警卫旅旅长杜春沂提名，杨爱源同意后由阎锡山委派。各级政训干部由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中的政训人员或学员中选拨。

在教导团中任团长的有：陈纯汉、贾毓芝、徐纪璋、武玉山、李挺秀、李冠军、刘鸿印、赵世铃、朵珍等。

在教导团中任政治主任的有：韩钧（军训二团）、张文昂（教八团）、李一清（教五团）。刘玉衡、傅雨田也在教八团待过。

村政协助员训练班。成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学员来源，主要由太原各校招收，也有来自外省外县的中学学生。集中训练十天到半月，就很快分配到各县去了（一县三至四人）。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左右又集中回来，一部分回训练班总结经验，一部分到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继续学习。

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分两部分：在太原的一部分归军政训练委员会领导；在省城以外的一部分由宋劭文负责。

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四月间。是由军政训练班的七队扩大组成的。训练班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是军训班和民训团的原班人马。

牺盟会太原市委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太原市的学生、工人参加抗日。太原的学生好发动，工人工作，困难较大。工人主要在兵工厂，而兵工厂又是很难进去的。

兵工厂的总办是张书田，这个人很反动。他无论如何不准我们牺盟会进厂。他曾公开威胁工人说：“谁参加牺盟会就开除谁。你们拿着我的钱，吃着我的饭，去参加牺盟会，就如同我的老婆管不了让人家去管一样。那还行！”于是，我们就发动工人群众起来和他斗。工人同志们问他：“牺盟会是阎主任（阎锡山）办的组织，我们是阎主任的工厂，你为什么不叫参加？牺盟会是抗日救国的组织，你为什么不叫我们抗日？不叫我们救国？反对抗日救国的人不都是汉奸吗？”他被工人们问得哑口无言，但还是百般阻挠。后来，我和薄一波亲自去找他交涉。我们也问他：“牺盟会是阎司令长官的抗日救国的组织，你为什么不叫工人参加？”他很不好意思地搭讪着说：“哪里！哪里！我怎么能不叫参加呢！不过，我可以给你们说老实话，工人么，只要他们外面有个组织给他们撑腰、支持，我这里就不好管理了，他们就好好干活了，也不听话了。所以，我就不想叫他们靠近你们。”我说：“那不行！抗日么，你就得允许。”经过交涉，总

算一许可工人参加抗日活动了。同时也把因参加抗日活动被开除的工人复了工。但他把这个工厂开除了的工人调到另一厂降级使用，用这种办法，压制工人参加抗日活动。张书田这个人鬼把戏多得很。他对我们说：“我这个厂，从来就不许可任何党派进入活动。就连国民党也不行。你们公开进厂宣传活动，这还是第一次，这我可有点受不了。”他和我们斗争，硬的不行，又换了一套软办法。他出了一个布告说：只要工人奉公守法，好好干活，他可以保送留美。可是谁也不听他的这一套，我们进厂宣传抗日很受工人的欢迎。他又要花招。我们进厂，他就宣布停工十五分钟“听牛先生宣传抗日”。我们一讲完，他就接着说：“牛先生来讲演抗日，这很重要。可是十五分钟过去了，这又耽误了十五分钟的抗日工作……。”不管他怎么讲，他那个禁区我们总算打开了，工人群众也逐渐发动起来了。太原撤退前后，曾有不少工人参加抗日武装和抗日工作。

我们和阎锡山搞合作，是要通过统一战线来发动群众抗日、发展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民主政权，而阎锡山则是要利用我们，和日本人、蒋介石讨价还价来保持他在山西的统治。所以，他对我们的信任是有条件的。比如薄一波从北平回到山西时，曾这样来试探阎锡山的态度：“我愿意回山西做抗日工作，给咱们山西办事。可是你也知道我是多年的共产党员。我那些老朋友难免要来找我。要是来了，我是接待呀还是不接待？”阎锡山有阎锡山的想法，他认为凡是被捕过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组织就不会信任他们了。所以，他认为薄一波等同志也是属于这号人。于是他就说：“那不要紧，你们的朋友来找没有关系，我们和共产党还要合作哩。”事实上也是这样。当时在牺盟会和新军中还有不少党员在工作，阎并没有十分追究，尤其是在太原时期。但是，他对外省人是不太相信的，有意识地不重用他们，但也是允许存在的。比如一九三七年后半，牺盟总

会要派一些人到各地打游击和建立抗日根据地，而且薄一波也要走了。牺盟总部由谁来负责领导工作？一波同志当时提出两个人来：一个是牛荫冠，一个是楼化蓬。因为楼化蓬不是山西人，就怎么也通不过。对于我，阎锡山就比较好通过，也没有直接对我进行考察。可是梁化之对我很不放心，在太原时期就作过一些考察。有一次，是牛佩琮同志和梁化之在一起站着谈话。突然梁化之把我叫过去问：“你知道裴丽生是不是共产党员？”这显然是对我，也是对裴丽生同志的考察。我怎么能说他是呢？当时说是，当然不能，说不是，也不恰当。所以我只能说：“我怎么能知道他是不是？我不知道。”这说明他们对我们这些人还是有怀疑的。怀疑尽管怀疑，但他们还是要利用的。

### 三、牺盟会成立一年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薄一波同志主持牺盟会工作开始，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前，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严格地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运用了面对山西现实与努力改造这一现实的工作方法，通过抓以下几件大事，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

#### （一）派村政协助员下乡宣传发动群众抗日

为了发展牺盟会的组织和发动群众抗日，首先组织了一批临时村政协助员，以协助村长办理村政的名义下到基层，去做实际上的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太原，我们用招考的办法，招收了一千多名各中学以上的进步青年和乡村中一部分充满革命热情的小学教员，以及几年来流亡在外或潜伏乡间的抗日青年，由牺盟会主办，集中训练十天，派到乡下去工作。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向农村各阶层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尽量把日军侵略的惨痛事实告诉群众，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发展牺盟组织，用十人团的方

式发展一百万会员；挑选会员中抗日意识强、努力工作者，介绍其投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

村政协助员下乡的时候，正处于绥远抗战开始和西安事变的当中。这些惊心动魄的事实，给了村政协助员们极大的鼓舞。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又利用阎锡山所提出的“消除社会不平”、“制裁坏官、坏绅、坏人”等口号，进行宣传发动工作。这一下，全省农村很快沸腾起来了。群众不仅要求抗战，而且提出了要民主与国民生计的改善；要建立能代表民意的政府；要爱国运动的一切自由；要反对土豪劣绅；要与坏村长算帐……。这一形势形成，是对旧政权、旧势力的猛烈冲击，当然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强烈不满。曾有不少人到省、县当局告村政协助员的状。但经过一段艰苦的过程之后，形势就有所好转了。村政协助员下农村仅三个月的时间，牺盟会的会员就发展到了六十万，两万名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学员的动员任务也完成了。山西农村的面目开始改观了，抗日的呼声充满了整个乡村。

## （二）开办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

为了武装群众抗日，借阎锡山要武装三十万民众的口号，牺盟会主办了训练两万名国民兵下级军官的教导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一共分了八个团，分散在崞县（原平）、忻县、祁县、太谷、寿阳、平遥等地。所有的学员都是牺盟会员。他们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抗日救亡而来的。这是一批有政治觉悟的、抗日情绪高、有文化的优秀青年。他们平时受训、上课，星期日就到附近的农村宣传抗日。军官培训能和群运结合起来，能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在山西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一九三七年八月，教导团改编为青年抗敌决死队到前线去参加作战了。决死队是党通过牺盟会直接领导与指挥的一支革命武装。

## （三）开办了军政训练班与民训干部团

军政训练班与民训干部团成立于一九三六年冬，这是给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培训工作人员，给新军培训军政干部，为民运工作造就民运干部的机构。那时，抗日救国运动还没有完全的自由，青年人的思想还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大压抑，全国青年正处于走投无路、报国无门的苦闷之中。由于牺盟会纲领的宣布和这两个训练团的成立，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就如潮水一般地涌到太原来了。两个团（班）合计有四千五百余人，包括着二十二个省的学生。尤以平、津、上海、武汉、河南、四川等地最多。这两个训练团（班）都住在太原国民师范的旧址，内分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培养军队政工人员）、冲锋上士训练班（培养军队下级干部）、妇女运动训练班（做妇女工作）、寒假或暑期训练班（前者专为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开设，后者专为太原中学以上学生开设）、牺盟干部训练班（训练牺盟特派员）。“七·七”事变后，还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战地动委会主持）。这两个团（班）的主要功绩就是为决死队、工卫旅、暂一师、政卫队及各种抗日游击队、各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民旅革命大学、各县牺盟会、各县抗日政权培养了大批骨干和军政指挥员。据一九三八年十月份左右统计，担任以上各单位领导干部的人数已达到三千人左右。当时就有人把这两个团（班）比拟为大革命时代的黄埔军校，这虽不甚恰当，但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 （四）狠抓了太原市委员会和往各县派特派员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春天，牺盟会太原市委员会建立之后，又建立了区一级的组织。此外，还建立了兵工厂工作委员会、铁路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都是在太原市委员会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牺盟总部从设在军政训练班中的牺盟特派员训练班中抽了一百八十余名特派员，分配到各县去开展工作。以前，虽然有过村政协助理员下乡工作，但还只限于进行一



般的宣传鼓动。真正开展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给牺盟会工作打下基础的，还是牺盟特派员。这批人下去后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有时连宣传抗日都要遭到旧势力的为难和阻拦。他们的工作重点是放在发动农民上。广大农民的觉悟和踊跃参加抗日工作，是和牺盟特派员的工作分不开的。

#### （五）召开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使牺盟会的工作发展到了最紧张和最实际的阶段。当我们一听到芦沟桥事变的消息后，牺盟总部便连续七、八个晚上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通过牺盟会机关刊物《牺牲救国》和太原市委员会办的《大众园地》两个刊物向各阶层人民加紧宣传，动员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要准备参加对日作战，反对一切不利于抗战的言行；迅速通电国民党政府中央，要求速调海陆空军北上抗日，援助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作战，并派出代表和各军界洽谈援助二十九军的具体办法；立即组织了大批宣传队、话剧团下乡宣传，并发动了一个“一百万人一大枚”每人一枚铜板的捐款签名运动；号召并征调了五万名少年先锋队员到太原受训。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活动，一百万人的签名捐款运动完成了。

“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九月，牺盟会又向山西当局提出了抗战紧急动员意见书。大体内容是：请政府颁布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如减租五分之一，停付外债利息，家属赤贫者应受粮食衣服之优待，子女入学免费，疾病官医负责，商医半价等十几条）；颁布“战时工厂法”（给年老体弱者以养老金，对参加前线抗战的要多发工资作为奖励等十几条）；改革政府机构，裁减冗员，提倡减薪；普遍减租减息；军内一律建立政治工作等。这些建议提出后，均被阎锡山批准实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向前发展。但由于旧军政官僚的阻挠和旧行政机构的不很好配合，太原的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于是牺盟会又发出了“向政